

CS主编 / 孙宏开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贵琼语研究

宋伶俐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贵琼语研究】



宋伶俐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贵琼语研究 / 宋伶俐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7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孙宏开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1604 - 1

I. ①贵… II. ①宋… III. ①羌语—研究 IV. ①H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2880 号

贵琼语研究

策划编辑：欧光明

责任编辑：刘海涛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mzcb.com>

印 刷：北京迪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0.00

定 价：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1604 - 1 / H · 793 (汉 24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主编：孙宏开

副主编：徐世璇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均 王辅世

孙宏开 陈宗振 欧阳觉亚

徐世璇 梁敏 黄行

毛宗武 胡增益 照那斯图

戴庆厦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政策,历来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为此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发现了不少语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言调查成果,曾作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写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于 1980—1987 年正式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促进了民族语文事业新的繁荣和发展,也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机遇。在此期间,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深入边疆、山区、海岛,又陆续发现了一批鲜为人知的语言。这些语言使用人口不多,往往不为外人注意,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尤其是一些使用人口越来越少的语言,急需抓紧时间调查,以保存这些珍贵的语言材料。为此,我们从 1992 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机构的支持下,对这些语言逐个进行系统、深入、全面的调查,已经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并决定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

我们认为,新发现语言的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与及时刊布,对

于进一步了解国情；对于发展语言科学，推动民族语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繁荣各民族文化；对于深入研究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编辑出版本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上海远东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

编审委员会

1996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人文背景概况.....	1
第二节 语言使用情况	30
第三节 研究现状	32
第二章 鱼通贵琼语音系	37
第一节 声母	37
第二节 韵母	41
第三节 声调	44
第四节 音节	44
第五节 元音和谐	45
第六节 贵琼语音系的变异	47
第三章 鱼通贵琼语词汇概况	57
第一节 词汇的一般特点	57
第二节 词汇的分类	59
第三节 词汇丰富和发展的方式	71
第四节 贵琼语词汇的变异	80

第四章 语 法	93
第一节 词类	93
第二节 句法	145
第五章 贵琼语的语言地位和系属	172
第一节 贵琼语的语音格局	172
第二节 贵琼语和其他语言的同源关系	188
第三节 贵琼语的词汇和语法要点	211
附 录	230
附录一 贵琼语词表	230
附录二 长篇语料	294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14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人文背景概况

一、贵琼语分布、族称和历史源流

贵琼语是分布在“藏彝走廊”上的一种民族语言。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在藏彝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① 这条走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西南的察隅、珞瑜”地区，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② 所谓“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主要是指在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高山峡谷中沉积的古老的社会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遗存，包括“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彝走廊”调查的成果陆续公布于世。“藏彝走廊语言”包括：藏缅语族的藏语支语言、彝语支语言和羌语支语言，壮侗语族的部分语言和苗瑶语族的部分语言，分别是：藏语、嘉绒语、白马语、羌语、普米语、尔苏语、纳木义

①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②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③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1）。

语、史兴语、木雅语、贵琼语、尔龚语、扎巴语、却域语、彝语、傈僳语、纳西语、白语、壮语、布依语、傣语和苗语等 21 种。^① 这些语言中有许多分布范围较小，使用人口较少，被当地群众称为“地脚话”、“土话”。贵琼语是其中之一。gui³³ tch⁵³ 是使用贵琼语的族群的自称，贵琼是它的音译。当地人称藏族为 bi³⁵，彝族为 lo³³ lo³³ mu⁵³，汉族为 džiē³⁵，有意识地将本族群称谓和其他族群称谓区分开来，形成自己族群的内部认同。

贵琼人生活的地域，主要在北纬 30 度左右的中心地带，处于民族南北东西迁徙的要道上。历史上，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鱼通区的舍联乡、时济乡、前溪乡、麦崩乡；金汤区的三合乡；泸定县泸桥区的长征乡、烹坝乡和泸桥乡等地的少数村寨以及雅安地区宝兴县硗碛乡的部分村寨都存在或曾经存在使用贵琼语的族群。而以康定县鱼通区的贵琼族群居住最为集中。本文所采用的贵琼语语料主要来自于康定县鱼通区。贵琼藏族的定居点之一——鱼通区，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东北部，在当地被藏族称为 n̥ø³⁵ th⁵³，这里东南西北分别为不同的族群所环绕：北面原有古道与金汤孔玉相连，今则有瓦丹公路与丹巴沟通；南面沿大渡河南下，有古道与泸定岚安和咱里千户的住民保持文化习俗的一致关系；东北有险峻的山路与原木坪土司辖域的宝兴相接；东部则与住民为汉化较早之青衣羌人的天全接壤；西部折多山以东与康定的康巴藏族有密切的政治宗教文化关系。

“鱼通”作为该地藏语的地名音译，在《元史》、《明史》、《清史稿》和一些地方志中有十多处用例。但少有单列，常与长河西、碉门、黎、雅、岩州等行政地理机构并举：

^① 刘辉强：《“藏彝走廊”的民族语言》，见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320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鱼通岩州等处达鲁花赤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以阿奴版的哥等为喝吾等处总管，并授玺书及金银符。（《元史·世祖本纪三》）

己酉，鱼通路知府高曳失获宋谍者，诏赏之。（《元史·世祖本纪四》）

诏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百人、汉军四百人戍碉门、鱼通、黎、雅。（《元史·世祖本纪七》）

丙午，敕东西两川发蒙古、汉军戍鱼通、黎、雅。（《元史·世祖本纪八》）

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元史·成宗本纪二》）

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元史·地理志三》）

六月，碉门、鱼通及黎、雅诸处民户，不奉国法，议以兵戍其地。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一百人、汉军四百人，往镇戍之。（《元史·兵志二》）

宣尉使司三朵甘宣慰使司。董卜韩胡宣慰使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明史·兵志二》）

天全，古氐羌地。五代孟蜀时，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安抚司。宋因之，隶雅州。元置六安抚司，属土番等处宣慰司，后改六番招讨，又分置天全招讨司。明初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隶四川都司。（《明史·四川土司列传》）

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在四川徼外，地通乌斯藏，唐为吐蕃。元时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隶吐蕃宣慰司。（《明史·西域列传》）

二十年遣惟善招抚长河西、鱼通、宁远诸处，明年还朝，言：安边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坚，虽远

而有功；恩威未备，虽近而无益。（《明史·西域列传》）

又鱼通、九枝蛮民所种不陆之田，递年无征。（《明史·西域列传》）

今鱼通、九枝疆土及岩州、杂道二长官司，东邻碉门、黎、雅，西接长河西。自唐时吐蕃强盛，宁远、安靖、岩州汉民，往往为彼驱入九枝、鱼通，防守汉边。（《明史·西域列传》）

元时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隶吐蕃宣慰司。（《明史·西域列传》）

明初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六安抚司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隶四川都司。（《明史·四川土司列传卷》）

雍正七年（1729年）废高杨两土司，设置天全州，鱼通隶属于木坪土司，在木坪土司处认纳“夷赋”。（《雅州府志》）

民国2年（1913年）3月，改康定府为康定县，鱼通土司辖地划归康定县。（《康定县志》）

民国21年，上鱼通地域设金汤设置局。1951年，撤金汤设置局，划归康定县。（《康定县志》）

民国28年改为鱼通乡，辖5个保。（《康定县志》）

1950年解放，1952年始建鱼通区人民政府，辖舍联、麦崩、时济、前溪4个乡，区驻地麦崩，1957年改为区公所，1959年区驻地迁至姑咱。1962年将城关区的瓦斯乡划归鱼通区管辖。1966年改名为红征区，1975年恢复鱼通区至今。（《康定县志》）

1992年底撤区建镇，瓦斯乡划归姑咱镇。（《康定县志》）

与“鱼通”并提的“黎州”、“雅州”、“宁远”、“碉门”均为行政机构。可见，历史上“鱼通”也曾作为一个行政机构，为中央王朝和其他民族势力交替掌控，其隶属关系元时归吐蕃，明时隶四川，清中期隶木坪土司归明正土司辖治。^① 历史上鱼通所辖范围较大。任乃强先生在《西康图经》中说：“折多山以东地方，古通称鱼通。”其辖域远大于今天的鱼通区，甚至涵盖了康定县的大部分地区。据民国初年的记载，鱼通地界“东与四川之天全、宝兴接壤，西至章谷梁子，与打箭炉河毗连，河东则南界泸定，北接金汤河，西北则至干沟与第八区——孔玉为界，南接瓦斯沟与第六区为界，东西约一百六十余里，南北约一百四十余里”。当时的鱼通包括上、下鱼通。下鱼通即后来的鱼通区，撤区后现为时济、麦崩、前溪、舍联四个乡及姑咱镇。上鱼通即后来的金汤区，撤区后现为三合、金汤、捧塔三个乡。历史上上鱼通由木坪土司管辖，下鱼通由木坪土司划给有姻亲关系的明正土司管辖。鱼通区所辖范围较以前缩小。^② 今天的鱼通区位于康定县城东 31 公里，大渡河中游两岸。东靠菩萨山和天全县接壤，南与泸定县毗邻，西与炉城区相接，北与金汤区、孔玉区相连。全区面积 752.79 平方公里，辖 5 个乡，1 个集市，43 个村。鱼通区政府在姑咱镇，北纬 30°7'，东经 102°10'，海拔 1630 米。

二、交通状况和经济形式

鱼通地处大渡河中游。大渡河从海拔 3000 米的高原蜿蜒而下，自北南下流程 80 余公里，流经大、小金川及丹巴，然后出

^① 土司制度是“土官制度”的一种。推行土司制度，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清后期“改土归流”，收土司权力归中央政府。

^② 本文所指的鱼通地区不包括金汤。

丹巴穿越鱼通地区的狭长地带，流经孔玉、鱼通，进入泸定。这一河段，两岸山高，河谷壁陡，交通不便。鱼通区内交通靠溜索和小木船。姑咱镇和时济村设有溜索^①，小木船只能在冬季枯水季节通航^②。直至20世纪中叶，居民外出向西尚需通过独木桥；向东则山路陡峭，运物艰难^③。本地居民的生活极为封闭。鱼通区对外的道路主要有四条：通往东北部孔玉和金汤各一条，通往西南部泸定和东南部天全各一条。通往东北部的道路贯穿上下鱼通，极为难行。通往孔玉的道路从江咀出发，全程近百公里，翻山越岭需要四五天。通往金汤的康金古道辗转在若干悬崖峭壁之间，道路凌空，猛兽出没。康金古道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鱼通土司由雅州改隶打箭炉厅之后得以局部扩宽，解放后经维修后可容骡马驮物。20世纪80年代大渡河流域修筑了瓦丹、干桐公路^④，修建了横跨大渡河的15座大桥，使鱼通乃至孔玉、金汤居民生活的封闭局面得以改观。相形之下，过去通往泸定和天全的交通来得方便些。从时济或前溪翻山到昂州，顺大渡河可以到泸定县城；从昂州翻越马鞍山沿成康古道支线可以到天全县城。旧时的交通状况影响了鱼通贵琼藏族的对外交往，当地的人口流动以汉族等民族迁入为主。

鱼通是康定县境内的主要农区。早在公元14世纪，当地居民就种植“水陆地”^⑤，农业开发较早。今天，当地还保留着烧

① 溜索由绳子和骑马棒以及木筒构成，因山势陡峭，河水湍急，故而不安全。

② 区内若吉、黄金坪和江嘴是冬天航行的主港口。夏天大渡河水势滔天，非常凶险，不能通航。

③ 到丹巴以及小金，往往走野坝，经鸡血梁子过怀抱石和鬼招手等地。鸡血梁子极为陡峭，运物艰难。谚曰：“鸡血梁子有点悬，牛舔盐巴二百钱。”

④ 干桐公路1988年底完成，全长75.4公里，从鱼通干沟到金汤桐陵。材料参考李静卿：《漫谈康定古今道》，见康定县委员会：《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康定县委员会，1991。

⑤ “水陆地”指水旱作物，亦指水田与旱田。

山开荒的传统。选择草木茂盛的山地，砍掉荒草后晒干，烧山，烧过的山地称之为“火桩子”，第一年的庄稼称之为“懒庄稼”，第二年才正式耕种。农业以栽种玉米、青稞、麦子、大豆、荞子和圆根为主。近年来开始栽种花椒、核桃等经济作物。田地里实行轮种和间种，玉米和大豆、红萝卜、豆子间种，玉米、冬麦和荞子轮种。田地里普遍使用黄牛或犏牛犁地。农田劳作讲求精耕细作，如玉米地里要薅三次草，头草、二草和三草。麦地里搭建了防野兽骚扰的“野猪房”，摆放了防鸟害的稻草人。农田劳动以妇女为主，男子在春耕与秋收农忙季节参与。

鱼通作为农垦区，经济基本自给自足，从事茶马贸易的马帮绕瓦斯沟而不经过鱼通域内，但集市贸易和外出采购使它与汉地的关系较为密切。普通百姓则多用药材、花椒、圆根、粮食和猪膘置换盐、针线、砂罐、衣物和酒等生活用品。交易过程简单，数额不大，有人称之为“袖子里头讲生意”。由于商业不发达，当地人的茶盐和衣物需要到康定购买。也有货郎走村串户，将汉地出产的生活用品销售到本地。近代土司统治时期，鸦片是土司家族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往往从丹巴和小金购置鸦片运抵康定、雅安、成都等地销售，以购买生活用品和枪支弹药。鱼通还有小手工业作坊和矿业，但并不发达。民国时期，金矿开发比较集中，矿工大多是本地人，矿老板被称为青山管事或者油米管事。当地的手艺人有铁匠、木匠、砌匠、剃头匠。民国时期外来工匠迁入，其中有烤酒师、裁缝和银匠，工匠的分布都很分散。整体来看，鱼通的经济形态比较单一。

近年来，商品经济观念在当地普及，鱼通经济形式得到改观。大渡河畔的坪坝村落大力发展庭院经济，科技种植蔬菜、经济林木，将农副产品销往姑咱、泸定、康定等地，外出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村民不少；交通通讯状况的改变为当地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坪坝村民自购私车从事运输业，并主动安装电话和闭路电

视，有的村落电视机、洗衣机的普及率达 100%。^① 经济形态的多样化既是族群接触的良性结果，也促进了贵琼人口的流动。

三、人口构成和居民来源

鱼通是康定县境内典型的汉藏杂居地。截止到 2006 年 6 月，鱼通四乡一镇人口总量为 12246 人，其中汉族人口 3727 人，藏族人口 8583 人，其他民族 31 人。^② 整体分布以藏汉杂居为主，局部地区为藏族聚居地。藏族聚居村 4 个，共 798 人，集中在麦崩乡和舍联乡；藏汉杂居并以藏族为主的有 21 个村落，藏族 6734 人，主要分布在麦崩乡、前溪乡、舍联乡和时济乡；藏汉杂居人口各占一半的有 5 个村落，藏族 624 人，主要分布在舍联乡和时济乡；藏汉杂居并以汉族为主的有 11 个村落，藏族 1261 人，主要分布在姑咱镇。换言之，鱼通藏族仅有 6.5% 的人口聚族而居，73% 的人口与汉族杂居，呈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式分布。鱼通地区人口分布情况大体如下表所示：

表 1-1 鱼通藏族的居住状况

居住情况	聚居	杂居（各占一半）	杂居（藏为主）	杂居（汉为主） ^③	总人口
主要分布乡镇	麦崩、舍联	时济、舍联	麦崩、前溪、时济	姑咱镇	四乡一镇
村落数量	4	5	21	11	41
人口数量	798	624	6734	1261	12246
所占比例	6.5%	5.1%	54.9%	12.9%	100%

① 金学明：《康定县鱼通地区若吉、舍泥两村社会调查及经济发展的思考》，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3）。

② 其他民族包括彝族 6 人，回族 13 人，蒙古族 9 人，羌族 3 人，总共 31 人。

③ 这个数据不包含姑咱镇汉族聚居区人口数据在内。

鱼通地区的住民，早先被称为“番”、“西番”^① 和“鱼通娃”^②，其来源据考有三支：其一，作为土司统治阶层的藏族；其二，元明清以来迁入的汉族“客户”；其三，贵琼藏族。

1. 历史上鱼通地区的统治阶层

鱼通的统治阶层为木坪（或穆坪）土司嫡出，木坪土司是嘉绒十八土司的一部分。“嘉绒十八土”，藏语称“嘉绒甲卡却吉”，是嘉绒藏区十八个有正式封号的大土司总称。道光十三年，清廷正式授予“鱼通长官司”封号给鱼通统治阶层，其治所在鱼通区麦崩乡。第一代鱼通土司甲天恩原从木坪土司分出，甲姓，不是汉姓，也不是贵琼姓氏^③，实际上是“坚参”、也“甲木参”的另一种语音形式，和木坪土司的姓相同。鱼通土司家族的成员，为多语人，会用藏语康方言、贵琼语和汉语。^④

2. 鱼通地区的汉族

鱼通地区的汉族均由外地迁入。迁入原因，据《西康图经》，康区移民主要有五方面：其一，驻军；其二，垦荒；其三，工匠；其四，开矿；其五，避难。而鱼道移民的迁入动因，以垦荒为主，其次是开矿，逃难。近年来则以教育移民为主。^⑤

驻军移民迁入较早。自元以来不断有军人迁入鱼通地区戍守，还有部分普通百姓被驱使为防守之士，这些百姓来自于大渡河下游方的泸定、石棉、汉源等地。《元史·世祖本纪》有元王

^① 赵心愚、秦和平：《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②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7。

^③ 贵琼姓氏没有“甲”姓。

^④ 刘辉强：《明正土司属地的民族语言概况》，见《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印，1986。

^⑤ 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7。